

中国作家不是超越的问题，是起伏太大了。读他的前后作品，你都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写的。我对自己警告不是超不超越的问题，而是不要呼啦一下下去了，这才是重要的。

张英：写作有压力吗？

阿来：我有压力的时候，是《尘埃落定》写完，找不到地方出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情绪比较沮丧。后来我从阿坝到了成都，涉及出版行业，面对杂志，有更现实忧虑。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，就业机会少，出现一个适合工作就去做，而且一定想把它做好。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，做杂志是一个团队的事，人家拿多少薪水，年终奖多少，房子的按揭能不能按时付，这都和我有关系。做杂志做到后来，那种新鲜感已经不再，商业操作有固定的模式，杂志发行几十万，也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慢慢淡出了，再写小说《空山》。

张英：为什么不喜歡“藏族作家”、“少数民族文学”这样的标签？

阿来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界定，暗含了一种歧视。完全是汉族的划分，一旦被认定为“少数”，就会得到很多帮助、照顾、扶持、培训、获奖，会有许多好处。靠这些照顾和扶持，不能出大成就，因为文学是有艺术标准的，那就是你的作品，到底写得好不好。

张英：所以你用“边疆”和“边疆文学”取代约定俗成的“少数民族地区”和“少数民族文学”。

阿来：主要出自地理上的考虑，大多数所谓的“少数民族”，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。

我觉得，《刘三姐》、《阿诗玛》

右图：《尘埃落定》电视剧剧照。



等“少数民族文学”，其实不是“少数民族”作家的作品，而是“多数”的汉族作家的作品，他们着力表现的，不是当地的“人”，而是异乡人走马观花得来的主观感受，是一种“他者”的写作。

当这些作品被模式化，这些作者“少数民族”的身份被认定之后，写作者就受了这种既定模式的影响，他书写的不是本民族的东西，而是汉族人眼里的东西，写作不是为了表达自己，而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想象，获得“多数”的承认，从而扭曲自己的文学创作。

中国的“东方主义”就是“少数民族”满足“多数民族”的想象。因此，对于“少数民族”作家来说，你的写作必须要遵循文学规律，写本民族的真实故事，遭遇和命运。但这样的写作有一个风险，那就是可能无法得到以汉族为主的绝大多数认同，从而没有市场。这造成了当下边疆地带的书写困难。

我觉得《空山》比《尘埃落定》好

张英：我觉得《空山》比《尘埃落定》要好，但市场没有《尘埃落定》那样火。

阿来：我也这样认为。《空山》没有《尘埃落定》那样畅销，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按照写作畅销书的路数，在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。今天，中国人整个文化趣味下沉，越来越娱乐化，你是跟这个方向，还是跟这个方向走？

我想法很简单，放弃做官、经商，按照自己的内心走，认认真真学习写作。我不敢说什么使命、责任，我也不是佛教徒，但我在这个土地上长大，有很强的宿命感。

作家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？我想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判断。我们靠自己的阅读，按照古今中外大家共同认定的一个经典文学标准，寻找自己的理想和道路。